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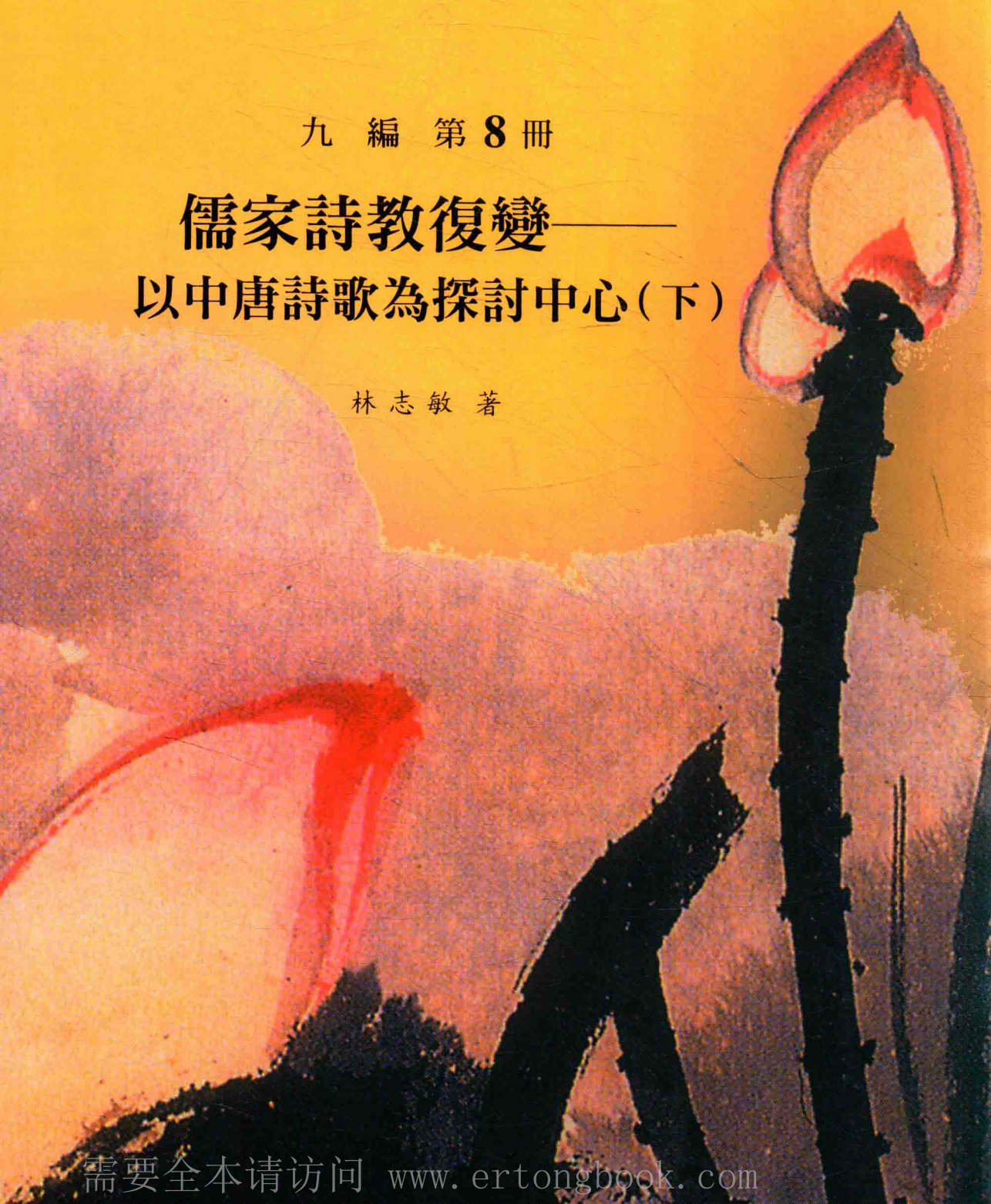
曾永義 主編

古典學研究輯刊

九 編 第 8 冊

儒家詩教復變——以中唐詩歌為探討中心（下）

林志敏 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　編

曾永義主編

第8冊

儒家詩教復變

——以中唐詩歌爲探討中心（下）

林志敏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儒家詩教復變——以中唐詩歌為探討中心（下）／林志敏著 — 初版 — 新北市：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4〔民 103〕

目 4+168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編；第 8 冊）

ISBN：978-986-322-540-9（精裝）

1. 唐詩 2. 儒家 3. 詩評

820.8　　103000750

ISBN-978-986-322-540-9

9 789863 225409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九　編　第 八 冊　　ISBN：978-986-322-540-9

儒家詩教復變——以中唐詩歌爲探討中心（下）

作　　者　林志敏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 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4 年 3 月

定　　價　九編 27 冊（精裝）新台幣 4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儒家詩教復變
——以中唐詩歌爲探討中心（下）

林志敏　著



目次

上　冊

緒　論……1

一、課題之確立……1

二、選題考量與價值……4

三、研究方法……5

四、研究成果……6

第一章　儒家詩教意蘊與唐前之詩教衍化……11

第一節　儒家思想與儒家詩教……11

一、儒家之尚用主義……11

二、儒家之尚用文觀……15

三、儒家詩教與其他……17

第二節　儒家詩教形成之意蘊及其文化內涵……23

一、孔子詩教形成之意蘊……24

二、詩教之思想本質與運用哲學……27

三、詩教的實用功能……34

四、孔子詩論「主情」說……39

第三節　漢魏六朝詩教之發展變化……42

一、兩漢：美刺政教……42

二、魏晉：抒情式寫實與偏取頌美……50

三、南北朝：理論過於實踐的詩教主張……52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四、隋朝：微薄之詩教理論提倡……54
第二章　初、盛唐：從寓變於復至質文半取……57
第一節　初唐貞觀君臣及孔穎達對詩教之論述……57
一、貞觀君臣的儒家詩教觀……57
二、孔穎達與《五經正義》……65
第二節　初唐詩人對儒家詩教的接受……70
一、初唐四傑：詩教復古之倡導者……71
二、陳子昂：詩教復變之濫觴……79
第三節　盛唐詩人對儒家詩教之紹承……89
一、李白：遊仙政教詩與抒情式之美刺……89
二、山水田園詩派：微薄的詩教承傳……97
三、邊塞詩派：援引詩教入邊塞題材……107
第三章　中唐的社會變革、儒學之復興與文學革新……119
第一節　中唐的社會變革與文學思潮……119
一、中唐前期的社會政治與文學思潮……121
二、中唐後期的社會政治與文學思潮……127
第二節　中唐的儒學復興與文學革新……135
一、安史之亂前的儒學與文學……136
二、中唐的儒學與文學……141

下　冊
第四章　中唐：意古而詞新……159
第一節　盛、中唐之際的儒家詩教雙璧……159
一、杜甫：從委婉至直切……160
二、元結：質樸與直訐……168
第二節　中唐前期美刺政教詩之倡導者……175
一、韋應物：將詩教精神與寓言結合……176
二、顧況：清狂式的政教詩……184
第三節　中唐後期劉、柳對詩教之接受……195
一、柳宗元：深婉隱微的政教詩……195
二、劉禹錫：蘊藉含蓄的美刺比興……202
第四節　中唐後期韓、孟的詩教觀念……211

一、韓愈：政教傳統的衝擊者……212
二、孟郊：詩教之過度捍衛者……221
第五章　唐詩對儒家詩教接受之高潮……231
第一節　元、白對《詩》及杜甫之承傳與變革……231
一、元、白對《詩》之紹承……232
二、元、白對杜甫之承傳與通變……239
第二節　元、白之諷喻詩與新樂府運動……244
一、諷喻詩之淵源與創作動機……245
二、「新樂府運動」之爭議……248
三、元、白之實踐與詩論……251
四、李紳、張籍及王建對元、白創作「新樂府」之影響……256
五、白居易之直切與儒家權變……259
第六章　晚唐：詩教復變之餘響……265
第一節　晚唐美刺政教詩的橋頭堡……266
一、皮日休：自我反省與實際建議……267
二、陸龜蒙：簡單承傳詩教精神……272
第二節　末代詩人之美刺比興……276
一、羅隱：尖銳潑辣地美刺政教……276
二、聶夷中：鄙俚質樸的政教詩……278
三、杜荀鶴：爲詩愁苦，悉干教化……279
第七章　儒家詩教影響下的唐代詩歌……283
第一節　詩教復變與唐詩風貌……284
一、文學復古論與詩教復變……284
二、唐朝之儒家詩教復古與通變……289
三、文學復變與儒家權變……295
第二節　詩教復變與唐詩之發展……300
一、正面成效……300
二、負面影響……308
參考文獻……313
後　記：不窺園的日子……325

第四章　中唐：意古而詞新

誠如論文第三章之分析，本書將中唐詩人劃分爲前後兩期來論述。中唐前期指向大曆元年（766）至順宗永貞元年（805）。論詩歌藝術成就，中唐前期應以大曆詩人爲代表，唯該詩風消極低迷，詩歌題材盡是酬贈送別、鄉愁羈旅或自然山水，對外在客觀社會不感興趣，也沒有積極入世之干政意識，詩歌無論如何與美刺政教尚有一段距離，故不宜列入討論。該時期卻出現了兩位比較特殊的詩人，即顧況及韋應物，他們的詩歌理論與實踐契合詩教精神，故本章第二節將他們列爲論述中心。至於活動於中唐前期後段之方外詩人與權德輿等新臺閣詩人，由於創作絕少攸關政教，故不列入評述範圍中。

中唐後期，學者或稱「元和詩風」，指憲宗元和元年（805）至文宗大和九年（835）。該時期著名詩家迭出，本章僅能摘菁探討柳宗元、劉禹錫、韓愈及孟郊等四位詩人的創作與詩教之關係。至於元稹與白居易，由於詩作與詩論頗契合儒家詩教精神，列入下一章，進行專章討論。

未進入探討中唐前期詩人前，即盛、中唐之際，存有杜甫及元結等一批詩風特殊之詩人。論詩風，他們不似李白等具有「盛唐氣象」，所以不該劃歸盛唐，同時他們也僅活動於中唐前幾年，詩風又不類中唐前期大曆詩人之藝術風格，故筆者權衡下將他們列入盛、中兩期之交來論述。

第一節　盛、中唐之際的儒家詩教雙璧〔註1〕

第三章第三節論述的五位詩人：李白、王維、孟浩然、高適以及岑參，除孟

〔註1〕聞一多稱李白與杜甫爲「詩中的兩曜」，本書則從詩教角度來視之爲盛、中唐之際的「儒家詩教雙璧」。參見聞一多：《唐詩雜論・杜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頁143。

浩然早逝，未經歷安史之亂外，餘者皆親歷該場驚天動地的浩劫。當中岑參活至大曆四年（770），〔註2〕其餘三位詩人都未踏入中唐前即離世。杜甫（712～770）與元結（719～772），彼此均活動於開元與天寶年間，經歷安史浩劫，同時又於中唐前幾年創作了大量高品質之作，論詩歌藝術風格，有些近盛唐，但大體與盛唐的審美取向有異，故有研究者稱他們爲「走出盛唐」〔註3〕之詩人。

杜甫早期的創作尚帶些激情洋溢以及意氣風發之盛唐氣象，如「岱宗夫如何，齊魯青未了。……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註4〕，其詩「氣骨崢嶸，體勢雄渾」〔註5〕。天寶之後，杜甫與元結耳聞目?盛唐由盛轉衰，深切感受政治腐敗，而隨後併發之安史劫難，導致百姓疾苦，使得他們的詩歌逐步走向現實主義道路。杜甫與元結乃「走出盛唐」人群中，最關心百姓，對國家命運表現得最具深刻反思與憂患意識者，兩者之詩歌理論與創作實踐亦大體相似，深蘊儒家「兼濟天下」以及美刺政教意識，可稱盛、中唐之際並肩高唱儒家詩教之雙璧。

一、杜甫：從委婉至直切

本書第三章論述了不少文學反映現實社會，社會環境亦影響了文學表達內涵之實例。盛、中唐之際詩教再度被宣導，與天寶年間的政治息息相關。盛唐自奸相李林甫掌相後，政治逐步腐敗，而天寶十五載（756）安史之亂爆發，其後連年戰亂，更讓民不聊生，生靈塗炭。隨後內亂雖稍平，吐蕃又入侵，藩鎮割據，朝內奸宦群小跋扈，皇帝敗德失政。大唐帝國經百餘年承平繁盛後，國事又再度紛擾，復陷戰禍中。

詩聖杜甫就在目睹諸種亂象下，創作了一首首暴露現實社會之不朽詩作，詩人發揮詩可以「興」、「觀」與「怨」之能，並以詩教美刺比興的表現特點來干預政教。雖然杜甫有些體現佛、道思想詩作存世，如「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愧葛洪」〔註6〕，「取供十方僧，香美勝牛乳」〔註7〕，以及「東

〔註2〕岑參詩歌語奇體峻，超拔孤秀，近盛唐多於中唐，故列入盛唐詩人中討論。

〔註3〕呂蔚：《走出盛唐的詩人——安史之亂與盛唐詩人研究》，陝西師範大學碩士研究學位論文，2002年4月。

〔註4〕〔唐〕杜甫：《望嶽》，〔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一，北京：中華書局，1999年，頁3～4。

〔註5〕〔唐〕杜甫：《望嶽》箋注，〔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一，頁5。

〔註6〕〔唐〕杜甫：《贈李白》，〔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一，頁42。

〔註7〕〔唐〕杜甫：《太平寺泉眼》，〔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七，頁600。

下姑蘇臺，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註8〕等，然而那不得視爲杜甫核心思想。唐詩人思想複雜，往往一人兼披多種思想，文學作品中糅雜儒、釋、道思想是時代習尚。況且杜甫讀書破萬卷，道藏佛經中本富有精妙語言、生動比喻，以及離奇想像，因此被詩人引用似乎是件很自然不過之事。

1. 儒學背景與蘊涵美刺政教之作

眞正影響杜甫一生的是儒家思想，該思想主要根源來自於家庭背景及自幼立定之志向。杜甫自小即生長於儒學家庭，「自先君恕、預以降，奉儒守官，未墜素業矣」〔註9〕。從詩人十三世祖杜預〔註10〕至祖父杜審言，世代素守儒業，詩人仰慕先祖，家世傳統觀念濃厚，因此立下「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註11〕，以及「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註12〕的積極入世偉大抱負。關於杜甫儒學之淵源，暫擱不究。筆者欲指出杜甫一千餘首詩作裏，契合詩教者多不勝數，若僅計其百餘首「即事名篇」之新題樂府詩，亦多以美刺比興爲中心，開啓了唐詩對詩教接受之第一高潮。杜甫於安史之亂後，創作「三吏」、「三別」及《兵車行》等，或委婉或直切地揭露諷喻居上者敗德失政，流露民胞物與之悲憫心。元稹稱之「近代唯詩人杜甫《悲陳陶》、《哀江頭》、《兵車》及《麗人》等，凡所歌行，率皆即事名篇，無復依傍」〔註13〕，貼切指出杜甫的寫實精神。

杜甫於《兵車行》〔註14〕一詩裏眞實地描繪玄宗用兵吐蕃，勞役百姓之悲慘圖景。詩人對被驅往死地的善良人民，以及拋骨絕域之冤魂，寄予深切同情。「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千村萬落生荊杞」，詩歌借寫漢武帝，曲筆諷刺玄宗，揭露他窮兵黷武之舉措，

〔註8〕〔唐〕杜甫：《壯遊》，〔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十六，頁1438。
〔註9〕〔唐〕杜甫：《進雕賦表》，〔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二十四，頁2172。
〔註10〕杜預乃晉代名將，素以武功、政事及學術著名，著有《春秋左氏集解》。
〔註11〕〔唐〕杜甫：《奉贈韋左丞丈二十二韻》，〔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一，頁73～80。
〔註12〕〔唐〕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四，頁264～275。
〔註13〕〔唐〕元稹：《樂府古題序》，冀勤點校：《元稹集》，卷二十三，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255。
〔註14〕〔唐〕杜甫：《兵車行》，〔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一，頁113～116。

爲國家及人民帶來了嚴重災難。杜甫詩歌特色之一爲字裏行間充滿儒家的憂患意識，該詩中即顯露詩人對國運之憂患。

「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杜甫高度同情人民，經常把百姓之痛苦高置首位。天寶十四年（755），詩人探視寄居在奉先的妻女，發覺幼子不幸活活地餓死，「入門聞號咷，幼子餓已卒」，詩人悲泣羞愧之餘，想到比自己更艱苦的農民和士兵，「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註15〕。當杜甫草堂茅屋頂爲八月秋風所卷破，徹夜難眠之窘境底下，詩人卻希望「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甚至表示若宏願能達成，「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註16〕。清人仇兆鰲（1638～1717）推譽「從安居推及人情，大有民胞物與之意」〔註17〕，可見詩人秉持儒家「人饑己饑，人溺己溺」〔註18〕之崇高精神。

比較能全面又深刻反映安史之亂實況及民生疾苦者，當推組詩「三別」及「三吏」。杜甫於該系列作品中，揭露與抨擊唐朝不合理之兵役制度。統治者剝削壓迫人民，而國難當頭時，卻又表現得昏庸無能，把戰禍全推予百姓，置人民於死地。

《新婚別》〔註19〕以新嫁女之口吻來娓娓泣述嫁與征夫之悲。詩歌伊始，新嫁女即擲下「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這麼一個血淋淋之控訴。爾後，詩人再代訴出甫婚遽別之沉痛，「君今往死地，沉痛迫中腸」。可詩歌後半段，竟轉悲痛之調，新嫁女反勸勉夫君：「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按唐律，凡新婚者，可以延後一年服役。〔註20〕如今朝廷不依法，強行征役，新嫁女內心雖有怨卻不怒。眞德秀指出「此詩所怨，儘其常分，而能不忘夫禮義」〔註21〕，

〔註15〕〔唐〕杜甫：《自京赴奉先詠懷五百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四，頁264～275。

〔註16〕〔唐〕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十，頁831。

〔註17〕〔唐〕杜甫：《茅屋爲秋風所破歌》，〔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十，頁833。

〔註18〕《孟子》：「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饑者，由己饑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4b.29）

〔註19〕〔唐〕杜甫：《新婚別》，〔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七，頁530～534。

〔註20〕眞德秀曰：「先王之政，新有婚者，期不役政」，參見〔清〕浦起龍：《讀杜心解》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頁55。

〔註21〕〔清〕浦起龍：《讀杜心解》上冊，頁55。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詩歌蘊含「怨而不怒」之特點，契合儒家「中庸」精神。

最後，詩中女主人公「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無奈地自慰亦自歎「人事多錯迕」，唯有遙盼「與君永相望」。杜甫借詩中女主人公之口吻來表達其政治思想，反映雖反戰卻不得不戰的心理，折射出詩人儒家忠君愛國之思想。

《垂老別》描述一老翁暮年從軍與老妻惜別之苦情，表現了勞苦人民的無窮辛酸與災難。《無家別》則寫相州潰敗後戰士返鄉，只見一片荒景，反映安史叛亂對農業生產及人民生活之嚴重破壞。

類似思想也深映於杜甫另一篇名著《新安吏》〔註 22〕裏。該詩作寫於安史之亂後第五年，詩之前半段敘述唐九節度使鄴城兵敗後，於新安大肆拉丁，不足兵齡的中男被迫赴前線之慘狀。「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道出亂世裏貧與富者皆無法幸免，深切訴出爲人父母者之共同哀慟，體現了詩人之仁心。詩人無奈下唯有安慰送行者莫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以免「眼枯即見骨」了。

杜甫於詩中段高呼「天地終無情」，歷來學者對該句多集矢。明末王嗣奭（1566～1648）指杜甫爲避諱而將「朝廷」言爲「天地」，〔註 23〕而清人浦起龍（1679～1762）則進一步解釋：「固是爲朝廷諱，然相州之敗，實亦天地尚未悔禍也。」〔註 24〕其意爲詩人雖委婉地掩飾朝廷之不是，然二十萬官兵之潰敗，乃至四下強拉夫，爲天地間不可逆料之事，罪不在居上者。由此，詩歌下半首筆調一轉，就出現「我軍取相州，日夕望其平」，「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等勸慰兼鼓勵從軍衛國之詩句。浦起龍指此爲「先以惻隱動其君上，後以恩誼勸其丁男」〔註 25〕，詩人體現出儒家仁義之道。

明人張綖（生卒年不詳）則認爲「兵者，聖人不得已而用之」，而似《新安吏》該類詩，是「不得已而用之者也」，張綖視其爲「慰」也。張綖指出「然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則所以慰、哀之者，亦刺也。」〔註 26〕這一說即幫助我們理解該詩最終還是緊扣於一個「刺」字上，充分展現杜甫之詩教精神。

〔註 22〕〔唐〕杜甫：《新安吏》，〔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七，頁 523～526。
〔註 23〕〔明〕王嗣奭：《杜臆》，卷三，上海：上海古籍，1983 年，頁 81。
〔註 24〕〔清〕浦起龍：《讀杜心解》上冊，頁 53。
〔註 25〕〔清〕浦起龍：《讀杜心解》上冊，頁 53。
〔註 26〕張綖曰，轉引自〔唐〕杜甫著，〔清〕仇兆鰲注：《杜詩詳注》，卷七，頁 525。

2. 袒露譏刺與思想之轉變

杜甫詩作內容多熱愛人民，體恤與憐憫民瘼。杜詩善批判政治弊端，揭露掌政者的專制無良，處處流露出「詩聖」對國家與人民命運深沉之關懷。然而杜甫一些反映社會慘狀詩作，語言袒露，直接針砭政弊，詩作內容雖合乎善道，其表達卻「哀且傷」。過於直露之詩句，叫人質疑其「諍諫」過於「譎諫」，似乎不符儒家「樂而不淫，哀而不傷」的中庸精神。筆者卻視杜甫該表面似乎非忠實地復古傳統詩教，其實卻是經過一番精細地審時度勢，權衡情境後之抉擇，個中精神仍舊契合詩教主旨。

杜甫《麗人行》〔註 27〕即是一首袒露諷喻之舊題樂府詩。此詩從修祓日楊國忠姐弟五家與扈從遊宴曲江之盛大排場描繪起，詩句盡陳對象「衣妝之麗」與「廚膳之侈」。楊貴妃得寵，連帶大姐被封爲韓國夫人，三妹爲虢國夫人，八妹則爲秦國夫人。詩歌中段「就中雲幕椒房親，賜名大國虢與秦」，直指詩中主人公爲「肌理細膩」、「態濃意遠」之楊氏姐妹，可見該詩之直切，沒多大曲折隱諱旨趣。《杜詩詳注》作者仇兆鼇稱「此詩刺諸楊遊宴曲江之事」，〔註 28〕研究者早洞悉詩人借詩來揭露上層社會的腐敗與國家政治之黑暗。論者又指出「本寫秦、虢冶容，乃概言麗人以檃栝之，此詩家含蓄得體處」。「含蓄得體」意指詩歌吻合詩教「溫柔敦厚」之運用原則，然而唯稍懂唐史者，不難瞭解該詩旨趣，更何況「賜名大國虢與秦」句，更明確圈點出詩歌嘲諷對象，似乎沒有任何含蓄蘊藉可言。

《麗人行》末句「炙手可熱勢絕倫，慎莫近前丞相嗔」，指出時任右丞相之楊國忠，驕橫跋扈，千萬不可得罪。斯時楊國忠手握國家重權，身兼四十多要職，勢如中天，頗有不可一世之蠻態。清人王夫之認爲「『賜名大國虢與秦』，與『美孟姜矣』、『美孟弋矣』、『美孟庸矣』一轍，古有不諱之言也，乃《國風》之怨而誹、直而絞者也」〔註 29〕。此外，沈德潛亦指出「極言姿態服飾之美，飲食音樂賓從之盛，微指椒房，直言丞相，大意本《君子皆老》之詩，而諷刺意較顯」〔註 30〕。清朝兩名家，不約而同地認同該詩具淺顯直露之譏刺味。

〔註 27〕〔唐〕杜甫：《麗人行》，〔清〕仇兆鼇注：《杜詩詳注》，卷二，頁 156～162。
〔註 28〕〔唐〕杜甫：《麗人行》箋，〔清〕仇兆鼇注：《杜詩詳注》，卷二，頁 157。
〔註 29〕〔清〕王夫之：《薑齋詩話》，卷一，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頁 143。
〔註 30〕〔清〕沈德潛：《唐詩別裁集》，卷七，長沙：嶽麓書社，1998 年，頁 145。

無可否認地，詩中「楊花雪落覆白蘋，青鳥飛去銜紅巾」句較委婉隱諱，其語義「隱語秀絕」〔註31〕，《杜詩言志》稱「其隱蔽周密，狡慧傳情，中菁之言，乃不可道」〔註32〕。該「不可道」句，也許蘊含暗喻國忠有私於虢國夫人之敗行，事實是否如此，就無法考察了。質言之，《麗人行》深爲杜甫一首直露且具政治預見性之刺詩。

歷來學者連篇累牘地討論杜甫思想之轉變。劉明華從「良臣」與「忠臣」的角度來論證杜甫實爲「諫諍型」之良臣，非簡單服從型之愚忠。〔註33〕傅紹良則引用多則《論語》與《孟子》章句來澄清杜詩過於直露之規諷，恰恰合乎「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3.19)，孔子主張的君臣相處之正道。世人曲解儒家之君臣關係，所以才誤認杜甫不合儒家思想。〔註34〕當中亦有較極端者如劉大杰於其《中國文學發展史》修正版裏論斷杜甫由早期「尊儒」，轉「疑儒」，再至「非儒」，最終走至「輕儒重法」之道路。〔註35〕筆者則從先秦儒家主張的「權變」概念來解釋該現象。

先秦儒家雖嚴格規定人們要遵循經道，但同時也認爲若客觀條件變動下，人們能自主地選擇一個切合時宜之權衡通變方法來應對。先儒包括孔子、孟子及荀子稱該方法爲「權」。筆者認爲杜甫從委婉至直切之譏刺，實受儒家權變觀念影響。關於「儒家權變」與「文學通變」之間的關係，本書第三章第一節末已略有提及，且會在第七章再進行詳剖，故不在此贅言。

杜甫君臣觀轉變之原由，葛曉音《略論杜甫君臣觀的轉變》早有詳盡闡發。本書於此處無所發明，僅將其概要整理如下：

玄宗時，杜甫原本極忠君。肅宗時，因替房琯說項事，杜甫遭罷免左拾遺。始悟君王非聖明，亦有失政時。此外，至德二載（757）玄宗還京後與肅宗父子之間的明爭暗鬥，更讓杜甫認清在上位者醜惡之嘴臉，忠君觀念開始

〔註31〕〔清〕浦起龍：《讀杜心解》上冊，頁229。

〔註32〕〔清〕佚名：《杜詩言志》，蘇州：江蘇人民出版社，1983年，頁25。

〔註33〕劉明華：《杜甫研究論集・杜甫「忠臣」的表現形態第二節諫諍而非服從——杜甫之「忠」表現之二》，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頁97～99。

〔註34〕傅紹良：《論杜甫的諫臣意識》，《陝西師範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98年03期。

〔註35〕劉大杰：《中國文學發展史》第二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6年。徐中玉對此課題有深入探討，可參見徐中玉：《不能夠這樣評論杜甫》，《古代文藝創作論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頁136～144。

動搖。代宗時，杜甫未就京兆功曹，捨棄汲汲所求之官職，證明其君臣觀已有大轉變。〔註36〕

雖說杜甫忠君思想已有轉變，唯由始至終「忠君」觀念仍深踞其內心深處。蘇軾曾稱杜甫「一飯不忘君」，此言雖誇大了些，但仍有一定之理據。筆者體察杜甫創作由初始之維護君王，委婉規諷，後期轉至直接鞭斥，其始終心繫君王，憂國憂民。該理正符合儒家「權變」概念，即於權衡通變中有固守之原則。杜甫不愚忠，詩歌裏有婉轉規諷，亦有袒露譏刺，而詩人自主性之展現背後，深懷一顆「忠君」之心。

筆者認爲杜甫該思想轉變，不該被視爲「非儒」，或「輕儒重法」。只要觀察詩人大曆元年（766）至三年（768）間於夔州之創作，如《秋興八首》其一〔註37〕：「叢菊兩開他日淚，孤舟一系故園心」；其二〔註38〕：「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南斗望京華」，等等，均細訴出詩人晚年無時無刻不忘故國。職是之故，與其說杜甫「非儒」，不如視之爲「念闕心態」更爲妥貼。

3. 杜甫詩教思想之評價

毋庸置疑地，儒家的政教文學觀深深制約了杜甫之創作。詩人存世之千餘首作品，質樸之語言表達中，深切蘊蓄抑揚起伏之愛國愛民情感。杜甫作品可讀之表面題材有廣泛反映民生疾苦，以及揭露腐敗黑暗等，而其意蘊卻無處不滲透詩人對儒家道德意識之信仰。清人仇兆鼇稱「論他人詩，可較諸詞句之工拙，獨至杜詩，不當以詞句求之。蓋其（杜甫）爲詩也，有詩之實焉，有詩之本焉」，又指出詩人的作品「即一鳥獸草木之微，動皆切于忠孝大義，非他人之爭工句者，所可同日語矣。」〔註39〕唯有長期不斷淫浸於儒家世界，以儒學爲思想核心，才能塑造如此崇高情操。《本事詩》之載述雖不可盡信，〔註40〕但作者孟棨首稱杜甫爲「詩聖」〔註41〕，千年來無異議，當之無愧。

〔註36〕段意大致整理自葛曉音：《漢唐文學的嬗變略論・杜甫君臣觀的轉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0年，頁405～412。

〔註37〕〔唐〕杜甫：《秋興八首》其一，〔清〕仇兆鼇注：《杜詩詳注》，卷十七，頁1484。

〔註38〕〔唐〕杜甫：《秋興八首》其二，〔清〕仇兆鼇注：《杜詩詳注》，卷十七，頁1485。

〔註39〕〔唐〕杜甫著，〔清〕仇兆鼇注：《杜詩詳注序》，頁2。

〔註40〕「孟棨《本事詩》，小說家流也。」參見〔明〕胡應麟：《詩藪・雜編》，卷二，《遺逸中・載籍》，北京：中華書局，1959年，頁265。

〔註41〕「杜甫逢祿山之難，流離隴蜀，畢陳於詩，推見至隱，殆無遺事，故當時號爲『詩聖』。」參見〔唐〕孟棨：《本事詩・高逸第三》，丁福保輯：《歷代詩

論文第二章論述了高適對政治之反思與國家前途之憂患，杜甫亦具該特質。子曰：「人無遠慮，必有近憂」（15.11），孟子更直指「君子有終身之憂」（4b.28），歷來中國知識分子於儒學之薰陶下，培養了一定程度的憂患意識。杜甫小至對個人仕途的擔憂，百姓安危的焦慮，大至整個國家政治之憂患，詩人似乎無時不在憂國憂民。對比同樣經歷天寶後期國家衰敗，以及安史之亂的李白、王維等詩人，杜甫詩歌折射出他就像一位終身憂慮之詩人。上揭杜甫多首美刺比興詩歌，創作背後動機就在於詩人飽滿之憂患意識。

杜甫具政治遠見，所以他對國家的憂患常常帶有預見性〔註42〕。上述《麗人行》，詩人攻訐楊國忠姐弟荒淫濫權，其實是對玄宗提出預警，可惜未收效。

杜甫一些詩作直接指明針砭對象，語言與詩旨過於袒露，似乎不符詩教傳統的運用哲學。杜甫該類詩作卻占數不多，時代環境雖逼迫詩人作出通變，但仍保留了一定的思想局限。宋人蘇軾曾對此給予意見：

> 太史公論詩，以爲『《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悱而不亂。』以余觀之，是特識「變風」、「變雅」耳，烏睹詩之正乎！昔先王之澤衰，然後「變風」發乎情，雖衰而未竭，是以猶止於禮儀，以爲賢於無所止者而已。若夫發於性止于忠孝者，其詩豈可同日而語哉！古今詩人眾矣，而杜子美爲首，豈非以其流落餓寒，終身不用，而一飯未嘗忘君也歟〔註43〕。

蘇軾曾給前代文人下過不少中肯評論，他把杜甫定位於儒家之世界裏。蘇軾認爲杜甫詩作「好色而不淫，怨悱而不亂」，不僅達至「發於性止于忠孝」的詩教委婉表達原則，甚至還能進一步堅守儒家推崇「臣事君以忠」（3.19）之經道。

文學上提倡復古，乃常有之事。詩教復古，更在歷朝中迭現，然而提倡復古者，往往不安於單純地墨守傳統，而是延續中有所通變。高適援引邊塞題材入詩教，韋應物則創作富美刺政教之寓言詩，杜甫詩歌題材雖多樣化，卻未於該方面提出貢獻。不過無論如何，杜甫讓直言不諱式的美刺政教詩作，開個端頭，該背離傳統的表現手法，筆者視之爲一項「通變」，爲革新詩教之

話續編》上冊，頁14。

〔註42〕劉明華對該課題諸多發揮。參見劉華明：《杜甫研究論集》，重慶：重慶出版社，2005年，頁12～15。

〔註43〕〔宋〕蘇軾：《東坡文鈔・王定國詩集敘》，高海夫主編：《唐宋八大家文鈔校注集評》，卷一百一十九，西安：三秦出版社，1998年，頁5551。

大貢獻。杜甫啓發了元稹與白居易之創作表現，元、白將該直訐無隱手法發揚光大，而繼杜甫及元、白後，中、晚唐美刺比興詩作，多不離該特色。

二、元結：質樸與直訐

比杜甫年小約七載的元結（719～772），其理論與創作均推崇風雅，強調詩歌的美、刺作用，亦爲盛、中唐之交的一位高唱儒家詩教者。

1. 儒學淵源與詩教主張

元結崇儒，影響者除了當時儒學復興之風氣，尚有詩人的家世淵源，以及自小接受之教育。

元結祖父元亨（生卒年不詳）曾勸誡元結由於歷代祖先「鷹犬聲樂是習，吾當以儒學易之。」〔註 44〕元結父親元延祖，雖不求仕進，可是安史之亂時，卻鼓勵子孫應挺身報國，「不可自安山林」〔註 45〕。先人告誡中蘊含儒家積極用世思想，說明元結自小接受的是傾向儒家式之家庭教育。

元結十七歲時「折節向學」，追隨從兄元德秀（696～754）。元德秀爲天寶年間之魯山令，素以崇高德行著稱。《新唐書》將元德秀列「卓行」，謂「天下高其行，不名，謂之元魯山」。〔註 46〕李華曾作《三賢論》讚美元德秀，並認爲「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註 47〕元德秀、李華及蕭穎士等均爲盛、中唐之際大力推展儒學之士。元結親承元德秀教誨近十年，自然深受其思想薰陶。

元結於其傳世的十卷詩文中，反復地提倡詩歌諷喻時事與裨補政治之功能。天寶三載（747），元結完成著名的《治風詩》與《亂風詩》共十篇。詩歌描盡古代治世與亂世之統治者的各種情狀，並於該詩序中自稱著「二風詩」的動機在於欲「求於司甌氏，以裨天監」〔註 48〕，詩人存有寫詩來救時補教

〔註 44〕〔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四，《列傳第一百一十九》，北京：中華書局，頁 4681。

〔註 45〕〔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四，《列傳第一百一十九》，頁 5565。

〔註 46〕〔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四，《列傳第一百一十九》，頁 5565。

〔註 47〕〔宋〕歐陽修、宋祁：《新唐書》，卷一百九十四，《列傳第一百一十九》，頁 5565。

〔註 48〕〔唐〕元結：《二風詩・序》，孫望校：《元次山集》，卷一，北京：中華書局，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